

新余文史資料

第三輯



32

新余文史資料第三輯

目 录

北伐軍新余之戰.....	(1)
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新余之役陣亡將士紀念碑.....	(8)
鈴崗嶺下談抗战 落星湖畔結情誼.....	(9)
湘贛邊區袁水分區抗日挺進第一師.....	(12)
抗日時期分宜駐軍情況.....	(23)
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	(25)
抗戰時期一次青年從軍.....	(27)
有反必肅 國泰民安.....	(30)
張國英反動事件始末.....	(35)
羅坊區一起反革命事件的回憶.....	(38)
夜襲觀巢區的陰謀被徹底粉碎.....	(41)
民國時期新余縣保甲制度概況.....	(43)
新余縣參議會簡介.....	(47)
張家坊大燒殺.....	(49)
冬防隊和傷兵事件.....	(52)
分宜縣商會四十年概述.....	(54)
張峰與花鼓山煤礦.....	(67)

工艺院和家庭纺织业	(70)
新余照相业的由来和发展	(73)
民国时期新余农村集镇中的骡马交易	(76)
建国前的赋税	(79)
分宜戏曲事业的发展	(82)
清末民初新余县城教育概况	(86)
复兴小学盛衰史	(93)
分宜的中医事业	(95)
旧社会的新余婚姻习俗	(101)
王寿松谈李为涟	(106)
袁杰三先生二三事	(108)
太平军在新余	(111)
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械斗	(115)
我在台湾军营的回顾	(118)
怀念恩师李之一	(123)

北伐军新余之战

樊 云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正式出师北伐，很快地在两湖战场上扫清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乘破竹之势，立即开辟江西战场。进攻赣西的北伐军第二、第三两军，从九月二日起向萍乡一线东进，沿途节节胜利，旬余，即攻宜春，进逼分宜、新余。

九月十一日，敌军从宜春向昌山溃退。昌山离分宜县城二十华里，是分宜城西的要冲。此地两山对峙，一水中流，缆舟为梁，极称险要。相传明末第二大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曾经在这个地方驻过兵。北伐军第二军第四师邓赫绩团，夜半袭击昌山，并乘胜穷追，于十二日占领分宜，遂麾旗指向新余。

当时驻守江西的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邓如琢。看到北伐军所向披靡，邓赶忙将自己驻在南昌、九江一带的中央第一师七千余人调抵新余，会同从萍乡、宜春溃退下来的赣西镇守使唐福山所辖的江西陆军第一师，张凤岐所辖的中央第九混成旅，在新余以西的仰天岗、福田岭、郭家坪、醴泉铺（今河下礼泉）一线设置重兵，妄图筑起一道屏障，凭险固守，阻止北伐军东进。

邓如琢原是赣北镇守使兼中央第一师师长，一九二六年三月，它勾结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把北洋军阀江西军务

督办方本仁起了出去，自己就任江西总司令。邓自恃有孙传芳为其后盾，从南昌来到新余督战时，俨然以一个大元帅自居，声言“十天内将北伐军赶出江西，直抵长沙”。据当时报纸描绘邓在新余时狂态：“凡绅耆之请谒者，务先详细盘查来历，一如讯问俘虏者。”该部承启员云：“你们南方没有一个好，遂不能不如是。”其咄咄逼人之势，真让人不寒而栗。唐福山、张凤歧原是方本仁的旧部，方被邓如琢驱逐后投奔了北伐军。北伐战争开始时，广东国民政府委方为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军军长，叫他随军进入江西，动员旧部倒戈北伐。因此，唐、张二部虽被邓收编，但毕竟心存芥蒂，军心涣散，抵御不力。邓如琢对此当然也心中有数，故而在分兵布阵时，令唐福山的江西陆军第一师、张凤歧的中央第九混成旅驻防正面，自己的中央第一师分布在左右翼，表面上是互相策应，实际上是对他们不放心，监视他们，让他们打头阵，好坐收渔利。

九月十二日，北伐军第二军、第三军从分宜向新余挺进。他们针对邓如琢的兵力部署，也兵分三路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左翼为第三军，由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率领，从上汾、观巢逼上仰天岗；中路为第二军第四师，辖谢伯毅、周纬黄、邓赫绩三团，由张辉赞指挥出界首逕攻郭家坪、福田岭；右翼为第二军第六师，辖黄友鹤、廖新甲、刘凤三团，由戴岳指挥经江口循袁水北岸绕攻敌之侧后方。当时第二军军长暂缺，副军长鲁涤平，党代表李富春。

九月十三日，第二军第四师在师长张辉赞、副师长王捷俊、督战委员长王锐带领下进驻醴泉铺。敌放弃醴泉铺退守郭家坪。

九月十四日，第四师谢伯毅团开始在佛冈与敌接触，激战数小时后，于上午九时占据普光桥（土江桥），与敌在郭家坪的主力对峙。

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的第四师邓赫绩团得知敌主力在郭家坪一带，于是勇猛冲锋，想冲垮敌军阵地，不料没有与其它兄弟部队策应好，进入敌军包围圈并被截断后路，几乎全团覆没。团长邓赫绩中弹身亡。张辉赞急忙命令教导队的迫击炮、机关枪接应。敌军顽强死守，几次组织反攻，并且另遣一支部队沿袁水侧进，欲抄第四师后路，恰好被第六师戴岳截住，一举歼灭。敌奸计未能得逞，复加强正面堵截。

九月十五日，敌军频频向第四师右翼猛攻，北伐军反而处于守势。营长李鼎权阵亡。张辉赞又急调第六师十八团罗略韬营加入正面，这样前线虽然得到巩固，但战斗仍然没有进展。薄暮时分，第四师又几次发起冲锋，皆未能奏效。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九月十六日，鲁涤平、张辉赞、王捷俊、王钺分赴普光桥（土江桥）高地、版陂铺北端高地督战。副军长鲁涤平重申连坐法令，务期灭此朝食，党代表李富春派政治委员多人深入各团宣传，士气为之一振。但是，邓如琢死力堵截，阵地旋得旋失。这时子弹亦快用光了（其时大批子弹均在萍乡），前方迭次告急。师长张辉赞打电话给第十团（周纬黄团）参谋主任张若愚说：“阵地万不可动摇，纵无子弹，尚有刺刀，倘犹无济，我亦必死在一堆，决不独还。”语极壮烈。没多久，第六师刘凤团从袁水北岸靠近郭家坪，在敌阵侧后方用炮轰击，敌军阵脚大乱。第四师乘机发起总攻，官兵冒死冲锋，营长谢少锄阵亡。中午，周纬黄团首先

攻上郭家坪高地。这样，敌阵中央被突破，邓如琢部遂溃不成军。第四师乘胜一鼓作气，挥军拿下与郭家坪互为犄角的福田岭。郭家坪的得手，使北伐军新余之战胜券在握。

与此同时，左翼第三军进攻仰天岗的战斗也已接近尾声。仰天岗，自东北向西南横亘于新余城西北约十五华里地段。这里山峦重叠，群峰如屏，巨石满布。山下有条深而窄的江，叫孔目江。当时只有一条小路，向西北可抵观巢等地，往东南可达新余县城，是难攻易守的军事重地。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邓如琢把自己的老本营驻在这儿，架设铁丝网，挖掘战壕工事（仰天岗上现在还有当年的战壕），企图负隅顽抗。

负责攻打仰天岗的第三军一部（据说皆由湖南等地的青年学生组成），由群众做向导，从观巢那边的一条小道攻击山上守敌。然多次冲锋，都被敌人击退。后趁敌人在山顶上的仰山庙内喝酒庆功之时，北伐军在群众的帮助下，绕过敌人的封锁，直插敌人的战壕旁，奇袭敌人，击毙敌团长王生乐，占领了仰天岗的最高峰。一直气焰嚣张的邓如琢听到这一消息后，如丧考妣，急令败将唐福山率残部前去支援，然此时败局已定，势难挽回。邓如琢只好收拾残兵败将，经罗坊往清江樟树一线退去。

九月十六日晚，前锋谢伯毅团进占新余县城。十七日，鲁涤平、朱培德等率第二、第三军大部开进新余城。到此，经过十四日以来的三昼夜角逐，新余之战宣告结束。这一战，北伐军先败后胜，重创敌军，使军阀邓如琢大部主力被歼。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邓部遭受这次打击后，“队伍不能成列，军心涣散，收拾不易，一直退过袁、赣两水，惊魂犹

未稍定。邓如琢见势不佳，乃拟向抚州窜去。”

虽然如此，北伐军所付出的代价亦非常昂贵。邓团长赫绩、李营长鼎权、谢营长少锄皆相继阵亡，兵士伤亡更是不计其数。据当地老百姓回忆，战后，阵地上陈尸遍野，无人收拾，尸体日晒夜晾，臭气熏天。村民们白天不敢上山砍柴，晚上不敢路过其地，说是有野鬼嚎号，哀声不绝，令人听了毛骨悚然。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为了纪念在这儿阵亡的将士，特地在孔目江南岸建了一座纪念塔，即“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塔”，当地人称作“忠人庙”。这座塔呈三角形，高七、八米，塔基是由大理石砌成的圆盘，塔尖似一把锄头，大概是为工农而战之意。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可惜这座好端端的塔，被几个糊涂人用雷管炸药炸塌了。

北伐军新余之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将士的斗志，其意义深远，影响极大。首先，新余之战歼灭了盘踞在江西的邓如琢匪第一方面军大部主力，大挫了邓的嚣张气焰，为整个江西战场上的胜利奠下了基础。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后期发展史上的三大巨头之一，而邓如琢又是孙传芳的一员得力干将，五省联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凭藉后台孙传芳，在江西不可一世，被人民视若洪水猛兽。新余之战，可以说是北伐军自入赣以来第一次与邓如琢较量。这一战，北伐军消灭了邓的大部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邓在江西的统治，大伤了孙传芳的元气，可谓是以后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前奏。

其次，新余是赣西通往赣中的门户，新余的占领，使整

个赣中门户洞开，北伐军得以长驱直入，进逼樟树、丰城、南昌，从而取得对整个江西战局的主动，邓如琢为了扫架，把所有兵力都用于应付前方战事，几至倾巢。“南昌城内只有一个骑兵团和宪兵连、省署警备队两连只能保卫各督署衙门，合计城内守敌不过六百余，几乎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见《江西党史讲义》P118）。这使北伐军得以乘虚而入。九月十九日，第六军十九师轻而易举地攻克南昌，北洋军阀的部队士气大伤，孙传芳的作战计划亦被搅乱。

再次，新余之战的胜利，使新余人民摆脱了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北洋军阀官僚的统治。北伐军占领新余城后，立即贴出安民告示，宣传自己的反帝、反封建军阀、反官僚的主张。不日，组建国民党新余县临时党部（办公地址设在陈家祠堂）、新余县政府，县长为一青年军官朱久云。自此，新余人民在新的政府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

究其新余之战取得胜利的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在战斗中出色的政治、组织工作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军中的模范先锋作用，以及北伐军广大将士的勇于牺牲精神之外，也与我们新余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

新余人民苦于封建军阀的统治已久，他们对军阀官僚匪兵的无恶不作早已恨之入骨。邓如琢部所到之处，杀猪宰羊、骚扰百姓，奸淫抢劫，焚毁民房，闹得老百姓鸡犬不宁。新余北门附近的贫民万顺元家饲养的大黄牛牯，被他们宰来一顿吃掉；界首地方有个姓王的姑娘，不幸被匪兵轮奸至死。战前，邓如琢勾结伪县官任超练在全县各地掠夺百姓的谷米七千余担，银元四千多块。人民忍饥挨饿还常常被抓去修筑工事，挑担带路，稍有怠慢，即被拳打脚踢，性命难

保。特别是罗坊沿河等地的群众，白天被强迫去拖船拉纤，夜晚还被用绳子缚住手足，禁闭在仓库里受冻。其深重的苦难，使他们对北洋军阀恨得咬牙切齿。罗坊斜里皮家皮元顺等贫苦农民七人，实在忍无可忍，手持扁担锄头，在一个深夜里伏在芦苇丛中，袭击了一条匪船，打得匪兵连呼救命。陶家的村民，也用梭标鸟铳抗拒前来抢劫的军阀匪兵。但这些小打小闹，终不成气候。

及至北伐军打了过来，广大人民群众感到该出气的时候到了，登丰区（现珠珊）竹头村的罗理明、罗明声等人，听到北伐军到新余的消息，迎出二十多里地，要替北伐军带路，挑军需用品。界首、观巢、洋津等地的群众把家里的粮食、稻草、干柴等，不断地送往当时驻在界首金鸡埠的北伐军临时指挥部。两军交火后，农民们更是踊跃参战，热望自己能亲手杀敌泄恨。我党著名的老革命家林伯渠，他当时是北伐军第六军党代表（军长程潜），曾随军到了新余。他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的日记中感叹道：“新余之战，有农民一千余人参加，纯以土炮轰敌，死农民可二百人，民众可谓充满革命性矣！”党中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的《中央局报告》中记载：“此次北伐军入赣，得民众之援助极大，尤其是江西方面，农民参战更为踊跃。如攻新余时，北伐军已不支，农民用土炮（约二百人）逐走敌人，北伐军遂得以冲上。……”新余之战的胜利，有新余人民的一分功劳。

新余之战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兴高采烈。他们箪食壶浆，歌声载道，迎接北伐军入城。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说明了北伐军的深得人心，证明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至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新余之役 阵亡将士纪念碑

章 琦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新余之役阵亡将士纪念碑位于渝水区沙土乡渡槽附近的东林庙，距市区五公里。碑为钢筋水泥青石板结构，高约15米，分基、座、身三部分。基圆形，直径6米，正面有台阶，四周浇铸钢筋水泥柱桩，柱与柱之间用银灰色钢管围成上下两圈，呈栏干状。碑身上竖三角形碑座，三面均嵌镶一块青石板，三块青石板上阴刻楷书碑文。碑文标题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新余之役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款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江西省政府委员王钧书。”碑身也是三角形，三面尺寸相等，略成棱形，正面上端刻有国民党党徽，下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新余之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碑身顶端塑有一把刺刀，象征国民革命军新余之役的军事上的胜利。

此碑创建于1929年8月，1970年4月（文革期间）被附近大队群众用炸药炸毁。碑文现已找到，市博物馆拟向市政府申请拨款按原制重建。

钤岗岭下谈抗战 落星湖畔结情谊

——上海战地服务团在分宜

王 建 成

1939年，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前来分宜，驻在钤岗岭下，落星湖畔，与分宜人民并肩战斗，留下了她们战斗的足迹和姐妹情谊。

上海战地服务团是何香凝女士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为抗日前线服务的进步组织，因为其成员均系女士，所以又叫“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服务团的领导人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8年服务团成立党支部，在南昌与陈毅同志接上了头，直接归陈毅同志领导。服务团的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做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团结广大军民一道抗日。

1939年，服务团到江西，5月在新余，8月到分宜。全团共三十六人，团长胡兰畦原为何香凝秘书。

当时分宜驻扎着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的部队，司令部设在城西桥下村，服务团随军部一同到达，驻城西落星湖村。

服务团在分宜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第十九集团军。服务团按照党的指示，坚持抗日统一战线，鼓励国民党官兵坚持抗战到底，教育士兵不要中途妥协，不要欺压群众。她们给士兵和当地群众演抗战戏，唱抗战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鼓励他们勇敢向前，为国增光。服务团还协

助部队医院建立民众医疗所，免费为驻地群众治病，此举深受群众欢迎。十九集团军在上高会战中之所以打得比较好，这与党的地下工作的密切配合有很大关系。

前方奋力作战，后方大力支援。服务团的同志多次发动群众，献物献钱，支援前线；组织慰问团到前线慰问；组织救护队抢救伤病员；组织洗衣队为战士洗衣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服务团的同志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大大激励了士兵和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使分宜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

发动群众，做群众工作，团结广大群众一道抗日，是服务团工作的又一方面。服务团经常办墙报、出战报、演戏教歌，宣传抗日道理，鼓励民众参军参战。一有空暇，就到农民家里串门聊天，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还和农民一道，收禾锄草，同甘共苦，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服务团在妇女工作方面，做得更为出色，创办妇女识字班，教妇女识字，还把儿童组织起来，仿照当年苏区的办法，也叫儿童团。钤岗岭下，落星湖畔，人们兴奋地议论，当年的红军又来了。

1940年2月，服务团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分宜，大部份奔赴延安，直接投入党的怀抱，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多的有益的工作。她们当中，有的战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有的在文化艺术界工作。胡兰畦、胡瑞英、秦秋谷、里路、李祥梅、李平……，这些老大姐的名字，或出现于全国政协，或工作于省、市机关，或散居于京、津、川、沪……。四十五年过去了，分宜人民还记得她们，想念着这些曾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老大姐们……。

原上海战地服务团的大部份同志，来到分宜，旧地重

游，旧情重叙。当年落星湖村的乡亲们，见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老大姐，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儿童团员欧阳禄祥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家里很苦，没有衣服，是杨琪大姐送给他一件大衣，度过那严寒之夜！欧阳义祥，见到了老大姐们，就向前来欢迎的群众说：“那时我们穷得叮当响，是服务团的同志送菜给我们吃。”年逾七旬的老妈妈李桂英，当年曾抱着孩子，亲聆服务团的教诲，她深情地说：“是她们教我识的字；她们是我的启蒙老师啊！”是啊！落星湖畔结情谊，铃岗岭下谈抗战，这一幕幕动人的景象，这战斗中结成的阶级爱、姐妹情，使我们永志不忘。

湘赣边区袁水分区抗日挺进第一师

廖星远

1945年，在袁水两岸活跃着一支武装力量，它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打击土豪劣绅，积极筹集枪枝弹药，扩大队伍。从4月正式成立，到8月鼎盛时，仅四个月，队伍就壮大到300余人，有枪200余支，它震慑了新余、峡江、分宜、清江、新干等县的土豪劣绅，惊动了江西省第二、三两区的国民党当权者，给在苦难中挣扎的袁水两岸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它就是以谭斌为首的“湘赣边区袁水分区抗日挺进第一师”（以下简称“挺进师”）。通过调查访问和对资料的反复考证核对，我们基本弄清了“挺进师”的情况。现依次叙述如下：

一

1945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解放区先后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并派遣部队挺进敌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1944年11月挺进东南后，在王震、王首道同志的领导下，在湘鄂赣三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开辟了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在这片土地上点燃了人民抗日的烽火。

然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奉行片面抗战、积极反共

的反动政策，社会更加黑暗、腐败。新余的情况，也不例外。当时的新余是：1、贪污成风，当权者大发国难财。1939年至1940年，仅两年的时间，县长宋炜就利用偷卖军粮、索取兵役贿赂、侵占征兵经费、吞蚀罚金等手段，贪污20万元。2、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县评价委员会公布的物价表记载，1945年11月猪肉每斤140元，12月200元，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涨了三分之一。3、征兵抓丁，民怨鼎沸。1937——1944年，新余出征的壮丁10600，占当时新余总人口16万的十五分之一。4、水利经年失修，自然灾害频仍。1943年，新余发大水，水口乡淹没稻田三分之二，洋津乡稻棉尽数浸没，潭口乡一月之内连续涨水三次，水位涨至八尺，稻棉颗粒无收。5、悍吏骄横、草菅人命。宋炜任县长时，从本籍带来壮丁200余人，分别安插在县自卫队、警察队和国民兵团，宋炜纵容他们横行乡里，滥杀无辜。1940年9月，在江东抢劫牛商四、五万元，打死牛商一人。6、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给新余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1939——1941年，日寇飞机曾多次窜入新余上空，丢掷炸弹，使无辜百姓丧生，房屋炸塌。即在平时，由于日机的窜扰，人民也过不上一天安稳日子，常常一夕数惊。内忧外患，新余百业凋敝，人民苦不堪言，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民族的解放，只有揭竿而起，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新余是块红色的土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1929——1934年，中国共产党曾发动、组织和领导这里的人民进行了如火如荼的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红军长征后，国民党以百倍的疯狂镇压革命，人民被迫转入地下斗

争。但是正如石在火种就不会熄灭一样，人在，深埋在心里的革命火种就不会泯灭。只要一遇东风，一有干柴，火就会迅速地燃烧起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形势，南下支队和新四军在湘鄂赣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的影响，国民党新余县政府的反动统治，日本铁蹄的残酷蹂躏，激发和加速了这一革命斗争的到来。

二

有了革命的形势，还得有发动者和组织者，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熊官盛和谭斌就是这一斗争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熊官盛，又名熊振中、熊苏民。1929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新余县东区区委组织部长、书记，北路独立团政委。红军长征后，在中共吉水区委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共吉水中心区委新余分区委、中共新余区委。熊任书记，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于1939年年底，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入狱。谭斌，又名谭新仁、谭克，1930年参加革命，历任工农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医院警备营长等职，1934年8月参加长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选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8月返梓开展抗日工作，刚踏上故土就被国民党新余县政府以“奸党”罪逮捕入狱，与熊官盛关在同一牢房里。由于肝胆相照，两人在短时间内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谭斌出狱后，他们不断书信来往，互相倾吐革命情怀，砥励报效国家的斗志。1944年6月21日，熊官盛在给谭斌的复信中说：“……我总急于想办法早脱狱苦，献身民族利益上，捐驱抗日战场，这样才不辜负我平生之抱负……”。谭斌曾写道：“铁窗是教育伟人之大学，希望同难者忍受着目前的痛